



ADAM SMITH
IN BEIJING

亚当·斯密在北京

21 世纪的谱系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意〕乔万尼·阿里吉/著
(Giovanni Arrighi)

路爱国 黄平 许安结/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DAM SMITH
IN BEIJING

亚当·斯密在北京

21 世纪的谱系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意〕乔万尼·阿里吉/著
(Giovanni Arrighi)

路爱国 黄平 许安结/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当·斯密在北京: 21 世纪的谱系/[意] 阿里吉著; 路爱国, 黄平, 许安结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6

(当代中国研究译丛)

ISBN 978-7-5097-0831-6

I. 亚... II. ①阿... ②路... ③黄... ④许...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21 世纪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1132 号

·当代中国研究译丛·

亚当·斯密在北京

——21 世纪的谱系

著 者 / [意] 乔万尼·阿里吉
译 者 / 路爱国 黄平 许安结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 站 支 持 / (010) 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 子 信 箱 / bianyibu@ssap.cn
项 目 负 责 人 / 祝得彬
责 任 编 辑 / 祝得彬 宋浩敏
责 任 校 对 / 张茂涛 蔡满虎
责 任 印 制 / 米扬 吴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3.5 字 数 / 383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0831-6
著 作 权 合 同 / 图字 01-2008-607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代序

资本的曲折道路*

——乔万尼·阿里吉访谈录

大卫·哈维

问：你能谈一谈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情况吗？

答：我于1937年生于米兰。从我母亲这边来说，我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我外祖父是一名移民意大利的瑞士人的儿子。他从一名工人贵族发家，在20世纪初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先是生产纺织机，后又生产供暖和空调设备。我父亲生于托斯卡纳，是一名铁路工人的儿子。他来到米兰，在我外祖父的工厂谋了份差。换句话说，他最后娶了老板的女儿。两人关系不时出现紧张，致使我父亲最终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同其岳父竞争。然而，他们两人都持反法西斯观点，并对我的童年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我的童年实际上处于战争笼罩之下：1943年罗马投降后纳粹占领意大利北部，反法抵抗运动，以及盟军进驻。

在我18岁时，父亲突然死于车祸。我拒绝了外祖父的建议，决定继续经营父亲的公司，并进入博克尼大学学习经济学，希望这有助于我了解如何经营企业。该校经济系是新古典主义的大本营，丝毫不为任何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所动，对于我经营父亲的公司毫无助益。我最后认识到自己不得不过问其关。后来，我在外祖父的一

* "The Winding Paths of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56, March-April 2009, 许安结、于江霞译，黄平校。

家工厂中做了两年的车间工作，负责收集组织生产过程的数据。这一研究使我确信，对于理解生产和收入分配，高雅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毫无助益。这成为我毕业论文的基础。后来我被任命为教授的不领报酬的教学助手，当时这是意大利大学阶梯的最基层。为了谋生，我在联合利华找了份做实习经理的工作。

问：你为何 1963 年又去了非洲并在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工作呢？

答：我去那里的原因很简单。我了解到，当时在英国的大学教书并做研究其实是有报酬的，不像在意大利的职位，必须先作为不领报酬的教学助手工作 4~5 年后才有希望获得有报酬的工作。1960 年代初，英国在其前殖民帝国纷纷建起大学，并作为英国大学的学院。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我申请了两个职位，分别在罗得西亚和新加坡。它们让我去伦敦面试。由于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对我感兴趣，它们就给了我一个经济学讲师的职位。这样我就去了。

这确实是知识的新生。我所接受到的是数学模型化的新古典主义传统教育，同我在罗得西亚的所见所闻以及非洲的现实生活是风马牛不相及。在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我同社会人类学家一起共事，特别是克莱德·米切尔和雅普·范维森，前者已在从事网络分析法的研究，后者正在提出情境分析法（后被重新定义为扩展案例研究分析法）。我定期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并受到这两位学者的巨大影响。我逐渐放弃了抽象的模型设计，转向具体的、经验主义的，并以历史为依据的社会人类学理论。我踏上了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走向比较历史社会学的长征。

问：这是你 1966 年发表的论文《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的背景。该论文分析了当地资产阶级发展的形式及其特定矛盾，而这又解释了导致殖民者组建的罗得西亚阵线党 1962 年获胜以及史密斯 1965 年发表《单方面独立宣言》的动因。回过头来看，你写这篇论文的最初灵感来自哪里，对你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答：写《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是受到范维森的启发，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使用数学模型。我曾就科林·利斯的《南罗得西亚的欧洲政治》写过书评，范维森建议我将其充实为一篇更长的文章。在此文以及《历史视角下的劳动供给》中，我分析了罗得西亚农民全面无产阶级化给资本积累造成矛盾的途径。事实上，无产阶级化最终为资本主义部门带来了更多问题而非有利条件。^① 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那么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贴补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生产了自己的部分生存品。不过，农民越是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向瓦解。只有在支付全部生活工资时，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劳工才会受到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化其实使对劳工的剥削更困难而非更容易，而且往往要求政权变得更加压制。例如，马丁·拉加西克和哈罗德·沃尔普均主张，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其政权不得不日益压制非洲劳动力，因为它已全面无产阶级化，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贴补资本积累。

整个非洲南部地区，从南非和博茨瓦纳经过前罗得西亚、莫桑比克、马拉维（前身为尼亚萨兰）直到东北角的肯尼亚，其共同特点包括：丰富的矿产资源、移民开发的农业和对农民的极度剥夺。这与非洲其他地区（包括北非）大相径庭。西非的经济体实际上是以农业为基础。但在南部地区（萨米尔·阿明称之为“储备劳工的非洲”），很多方面都可谓是农民遭到极度剥夺进而无产阶级化的范例。我们中的几位指出，这种极度剥夺的过程是相互矛盾的。一开始，它为农民贴补资本主义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等创造了条件。但它也日益为剥削、动员和控制正在出现的无产阶级制造了困难。我们当时的研究，包括我的《历史视角下的劳动供给》

^① 见 Arrigh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hodesia", *NLR* 1/39, Sept-Oct 1966; Leys, *European Politics in Southern Rhodesia*, Oxford 1959; Arrighi, "Labou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collected in Arrighi and John Sau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1973.

以及拉加西克和沃尔普的相关著作，都证实了后来著名的关于无产阶级化和剥夺的局限性的南部非洲范例。

同那些仍然把资本主义发展简单视为无产阶级化的学者（如罗伯特·布伦纳）相反，南部非洲的经验表明，不论从本质上还是从其自身来看，无产阶级化都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其他各种各样的环境都是必需的。就罗得西亚而言，我把无产阶级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只有一个阶段有利于资本主义积累。在第一阶段，农民通过提供农产品，对农村资本主义发展作出反应，并且只有在得到高工资的情况下才提供劳动供给。因此，劳动力短缺成为整个这一地区的特色，因为不论资本主义农业或矿业何时开始发展，都创造了对当地产品的需求，而非洲农民又非常迅速地提供了这些产品。他们可以通过出售产品而非劳动来参与到货币经济中。国家支持移民发展农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形成与非洲农民的竞争，如此一来他们将被迫提供劳动而非产品。这导致了一个从部分无产阶级化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漫长过程。然而，如前所述，这也是个相互矛盾的过程。简单的“无产阶级化等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型的问题在于，它不仅忽视了南部非洲移民资本主义的事实，而且忽视了其他很多事例，如美国本身。美国的特色截然不同，它综合了奴隶制度、对土著人的种族屠杀以及来自欧洲过剩劳动力的移民等。

问：在史密斯政府 1966 年 7 月的镇压中，你是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因政治活动被捕的九名讲师之一吗？

答：是的。我们被关了一个星期，然后被驱逐。

问：你去了达累斯萨拉姆，而当时那里在很多方面听起来都像知识分子交流的天堂。你能否给我们讲一讲那段时光以及你同约翰·索尔的合作？

答：无论学术上还是政治上，这都是激动人心的时期。当我 1966 年来到达累斯萨拉姆时，坦桑尼亚才独立几年。尼雷尔正在宣扬他设想的一种非洲社会主义模式。他在中苏论战期间力图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并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达累斯萨拉姆成为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所有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流亡者的前哨基地。我在当地大学工作了三年，结交三教九流，如来自美国黑人权利运动的活跃分子，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大卫·埃普特、沃尔特·罗德尼、罗杰·默里、索尔·皮茨奥托、凯瑟琳·霍斯金斯、吉姆·梅隆（后成为“气象员派”创始人之一）、路易莎·帕瑟里尼（当时正在研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等学者和知识分子，当然还有约翰·索尔。

在达累斯萨拉姆与索尔共事期间，我的研究兴趣从劳动供给转向了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政权问题。对于这些政权能否从刚刚开始的新殖民主义中解放自我并真正履行经济发展的诺言，我们都持怀疑态度。但我们之间也有分歧，我认为这一分歧至今尚存，而且索尔对此的愤怒远远超过了我。对我而言，这些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绝非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当它们接受社会主义的言论时。它们是平民主义政权，因此除了民族解放外，我并不指望更多，而我们都认为民族解放从本质上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除此之外是否还会有政治发展的可能性，至今索尔和我见面时，仍会愉快地争论一番。但我们共同撰写的论文都是我们有着一致见解的评论。

问：当你回到欧洲，发现其同六年前已迥然不同了吧？

答：是的。我1969年回到意大利，并立即陷入两种境遇。第一种是在特兰托大学，我在那儿得到了讲师职位。特兰托是学生运动的主要中心，也是当时意大利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唯一一所大学。我的职位获得了大学组织委员会的推荐，该委员会由基督教民主党人尼诺·安德里亚、自由社会党人诺伯特·波比奥以及弗朗西斯科·阿尔博洛尼组成。这是通过雇用激进分子来招抚学生运动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我开始授课的第一学期，只有四五名学生。但等我有关非洲的作品于1969年夏天问世后，当秋季开学时，有上千名学生试图挤入我的教室。^① 我的课程成为特兰托的重要活动，甚

① Arrighi, *Sviluppo economico e sovrastrutture in Africa*, Milan 1969.

至使“不断斗争”组织出现分裂：博托派希望学生来听课，听关于发展理论的激进评论，而拉斯塔诺派则试图通过从院子里向教室扔石头来破坏这门课。

第二种境遇是在都灵。我是由路易斯·帕瑟里尼介绍去的，而他是境遇主义作品的主要传播者，因此对欣赏境遇主义的“不断斗争”组织的很多干部有着巨大影响。我频繁地经米兰往返于特兰托（学生运动中心）和都灵（工人运动中心）之间。这一运动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其反“政治”的一面，在吸引我的同时也令我感到苦恼。在一些集会上，非常好战的工人会站起来高呼：“受够了政治！政治在把我们拖向错误的方向。我们需要团结。”由于我从非洲归来，看到斗争中的工人们视共产主义工会为反动的压制性组织，我深感震惊。对意大利共产党工会的反对演变成对所有工会的反对。诸如“工人力量”和“不断战斗”组织把自己定为工会和群众政党的替代者。与罗马诺·马德雷一起，我们开始产生寻找与该运动有关的葛兰西战略的想法。马德雷当时既是一名学生，也是政治干部和葛兰西主义者，而这在议会极左翼中非常罕见。

工人阶级知识自治的“自主”思想由此首次出现。这一概念的产生如今通常归功于安东尼奥·内格里。可事实上，它始于1970年代初我们在由马德雷、帕瑟里尼和我共同创办的葛兰西小组中发展的对葛兰西的解释。我们认为自己对该运动的主要贡献，并非提供了工会或政党的替代组织，而是作为参与到工人先锋队援助活动中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通过对国内外斗争的更广泛过程的理解，推进了他们自己的自治——工人自治。用葛兰西的术语来说，这被视为开展斗争的工人阶级中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最后我们成立了工人政治集体 [Colletivi Politici Operai (cpos)]，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自治空间 (Area dell'Autonomia)。随着这些集体推出其自己的自治活动，葛兰西小组将暂停运作，并且可以解散。当它于1973年秋季真正解散时，内格里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把工人政治集体和自治空间引向与最初理想差之千里的冒险道路。

问：你从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和意大利工人阶级斗争中是否得出了共同的经验教训？

答：这两次经历的一个共同点是我同更广泛的运动都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想了解我参与其斗争的基础是什么。我的立场是：“我不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因为你们对自己处境的了解永远比我清楚。然而对于了解其发展的更广阔背景，我的条件更优越。因此，我们的交流必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你们告诉我你们处境如何，我告诉你们这同你们从自己行动的角度出发，所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更广阔背景的联系是什么。”无论同南部非洲解放运动还是同意大利工人，这总是保持极好关系的基础。

1972年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文章都源自这种交流。^①工人们被告知，“眼下正发生经济危机，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如果我们坚持斗争，工厂的就业机会就会丧失”。工人们因此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处于危机中吗？果真如此的话，其影响是什么？我们是否因此只能保持平静？”《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刍议》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棘手的、工人自己构建的环境下写成的。工人们说：“告诉我们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必须对什么有所期待。”这些文章的出发点是，“看，无论是否开展斗争，危机都会爆发。它们不是工人武斗或经济管理‘错误’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积累活动本身的根本所在”。这是最初的定位。文章写于危机刚刚爆发，在危机的存在成为共识之前。它作为我长年累月用来跟踪事态发展的框架变得重要起来。从这一角度来说，它发挥了相当好的作用。

问：我们还将回到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但我首先想了解一下你在卡拉布里亚大学的工作。1973年，正当这场运动终于开始平息时，你接受了在科森察的教职吧？

^① 英文论文见 Arrighi, “Towards a Theory of Capitalist Crisis”, *NLR* 1/111, Sept - Oct 1978; 首次发表于 *Rassegna Comunista*, Nos 2, 3, 4 and 7, Milan 1972-3。

答：卡拉布里亚吸引我的一点是，我可以在一个新的地方继续从事劳动供给的研究。我在罗得西亚时已看清，当非洲人全面无产阶级化，或更确切地说，当他们意识到正在全面无产阶级化时，这是如何引发城市地区争取生活报酬的斗争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单身男性，我们的家人继续在乡下过着农村生活”之说只是个想象，一旦他们不得不真正在城市中生活，这无法持久。我在《历史视角下的劳动供给》中已指出这一点。在意大利，这变得更加明朗，因为存在这样一个谜团：从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初，南方移民作为不愿参加工会的工人被带到北方工业区。但从 1960 年代起，特别是在 1960 年代末，他们却被转化为阶级斗争的先锋队，而这又是移民的典型经历。当我在卡拉布里亚建立研究小组时，我要求他们研读有关非洲的社会人类学作品，特别是有关移民的作品。然后，我们从卡拉布里亚对劳动供给进行了分析。问题在于：是什么在为这种移民创造条件？在某一点上，移民自身成了好战的先锋队，而未成为可用来破坏北方工人阶级谈判能力的驯服的劳动力，其局限性是什么？

该研究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并非必定依赖于全面无产阶级化。一方面，背井离乡的劳工移民活动发生于没有出现剥夺的地方，发生于移民甚至有可能购买地主土地的地方。这同当地的长子继承制有关，即只有长子可以继承土地。传统上，年幼些的儿子最终都会加入教会或参军，直至大规模、长距离的移民成为愈益重要的替代方式，他们借此可以挣到买回土地并建立自己的农场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在劳工被全面无产阶级化的赤贫地区，他们通常根本无钱移民。例如，当 1888 年巴西废除奴隶制并需要廉价的替代劳动力时，他们才获得了达到此目的的唯一途径。巴西从赤贫的意大利南部地区雇用工人，为其支付路费并让其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取代被解放的奴隶。这是截然不同的移民方式。但总体而言，移民的都不是赤贫者，因为要想移民就必须有些资金和关系。

从卡拉布里亚研究中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同有关非洲的研究结果

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这里，移民在其迁居的地方从事工人阶级斗争的倾向，也取决于是否拥有据认为永远决定其生活机会的条件。这还不足以说明迁出地区的情况决定着移民愿意工作的报酬和条件。人们必须证实，到什么程度，移民才会认为自己的大量生计来自于有报酬的职业。这是可以察觉并可以跟踪的转变。但新冒出的主要观点则是针对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过程等同于无产阶级化的思想的一种不同的批判。

问：有关这项研究的初稿在罗马时被人从车中偷走。因此，在1979年你搬到世界体系分析法方兴未艾的宾汉姆顿大学后又过了多年，你才在美国最后定稿。这是否是你首次就无产阶级化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针对沃勒斯坦和布伦纳明确表达你的立场？

答：是的，尽管我表达得仍不够清楚，即使我是顺便提及沃勒斯坦和布伦纳，但整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二人的批判。^①沃勒斯坦的理论认为，生产关系取决于它们在核心—边缘结构中的位置。在他看来，处于边缘，你往往具有强制性的生产关系，不具有在核心发现的那种境遇，即完全无产阶级化。在某些方面，布伦纳与其观点相左，但在其他方面，观点又非常相近，如生产关系决定其在核心—边缘结构中的位置。在二者中，你具有核心—边缘结构中的位置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卡拉布里亚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同一外围区域，我们发现了三条同步发展并且相互强化的道路。另外，这三条道路很像历史上作为不同核心区域特征的发展方式。一条道路非常像列宁说的“容克”路线——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大农场；另一条像列宁说的“美国”路线，中小型农场植根于市场。在列宁那里没有第三条道路，即我们所称的瑞士路线：先是背井离乡移民，然后再投资并保住家乡的财产。瑞士不存

^① 见 Arrighi and Fortunata Piselli,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Hostile Environments: Feuds, Class Struggles and Migrations in a Peripheral Region of Southern Ital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x, no. 4, 1987.

在对农民的剥夺，只有造成小农业整合的移民传统。在卡拉布里亚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所有三条道路都在此间外围找到了，而在其他地方这却是同核心的位置相联系的。这既是对布伦纳有关无产阶级化单一过程理论的批评，也是对沃勒斯坦有关生产关系追踪位置理论的批评。

问：你的《帝国主义几何学》发表于1978年，是在去美国之前。重读此文，看到你用数学隐喻——几何学——来分析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并起到了非常实用的效果，我感觉震动很大。但在文中有一个有趣的地理问题：当你把霍布森和资本主义放在一起时，由于几何与地理随着你的论述而转化，霸权的概念突然出现了。你写《帝国主义几何学》的最初动因是什么，这又对你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答：当时，围绕“帝国主义”产生的术语混淆令我厌烦。我的目的是要通过创造拓扑空间，让其中在指代“帝国主义”时常造成混淆的不同概念能够相互区分，从而部分地消除混乱。但作为有关帝国主义的一次演练，对我来说它也确实发挥了霸权概念转化的作用。我在1983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几何学》第二版后记中明确阐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分析当代国家间体系动态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比“帝国主义”更有用。从此观点出发，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只是重新应用葛兰西关于国家间关系的霸权概念。在葛兰西之前，这一概念最初曾应用于国家政治管辖权内的阶级关系分析。当然，葛兰西为此用很多以前无法理解的方式丰富了这一概念。这使我们在将其再度应用于国际问题时受益匪浅。

问：在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中，对概念有着核心影响的是布罗代尔。在汲取其营养后，你对他还有重要的批评观点吗？

答：批评轻而易举。布罗代尔是有关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信息的巨大源泉，但他没有理论框架。或更准确地说，正如查尔斯·蒂利所指出的那样，他太喜欢搞折中，以至于他拥有无数的不完整理论，而这些理论相加却什么也不是。你不能简单依赖布罗代尔。在

研究他时，你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要从他那里汲取什么。我重点关注的是民族—国家体系的思想。当它在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时，是以城邦国家体系为先导的，而且人们必须到城邦国家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布罗代尔在这方面同沃勒斯坦等所有世界体系分析家看法不同，更别说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更传统的经济历史学家了。这是西方或欧洲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显著特点。然而，如果你对布罗代尔亦步亦趋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把你领向很多不同的方向。例如，我必须汲取这些观点并将其同我从威廉·麦克尼尔的《权力角逐》中所学的综合起来。麦克尼尔还从不同的角度辩称，城邦体系在前，并为领土国家体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问：另一个思想所提概念是，金融扩张宣告了特定霸权体系进入晚秋，并拉开了向新霸权转变的帷幕。你对此给予了更重要的深度理论分析，但这仍然来自布罗代尔。这将像是对《漫长的20世纪》的深刻参悟吗？

答：是的。其思想在于，某个特定时期的首要资本主义组织也将是金融扩张的领导者。通常当生产力的物质扩张达到极限时，就会出现金融扩张。这个过程逻辑是，当竞争加剧时，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变得日益严重，因此积累者的流动性偏好凸显，这反过来又创造了金融扩张的供给条件。不过，布罗代尔又未论及这一点。下一个问题当然是金融扩张的需求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在这方面，我信赖韦伯的观点，即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特征。我认为，这种竞争创造了金融扩张的需求条件。布罗代尔的“晚秋”观点至关重要。就像积累的领导过程的最后阶段一样，它从物质积累发展到金融积累，并且最终被另一个领导者所取代。但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认为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国家的晚秋也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马克思因此使我们能够对布罗代尔的思想进行补充，即晚秋成了其他地方的春天，进而带来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发展。

问：《漫长的20世纪》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你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出现，并消除了国家间的混乱状态。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后面的霸权终结了此前的混乱时期，从而形成如期而至的现象，你认为这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答：问得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偶然性因素总是存在的。与此同时，这些转移之所以持续这么长时间并经历了骚乱和动荡时期，是因为这些代理人本身后来在兴起并组织体系时，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案例——美国，这一点也显而易见。时至19世纪末，美国已具备一些可能使其取代英国霸权领导地位的特征。但历经半个多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灾难性的大萧条后，美国实际上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起使其能够真正称霸的架构和思想。美国在19世纪作为潜在霸权国家的演变完全是偶然的吗？抑或还有其他原因呢？我不知道。毋庸置疑，地缘上偶然的一面是存在的：美国的立体构型不同于欧洲，从而这种构型使其可以创建一个在欧洲自身无法创建的国家，而欧洲除非在其东翼存在这种可能，但那里俄罗斯也在搞领土扩张。不过，系统性也是存在的：英国创建了国际信用体系，并且在发展到某个阶段后，它在某些方面对美国建国起到推动作用。

当然，如果没有美国，考虑到19世纪末特定的历史地缘架构，历史本来会截然不同。本来哪个国家会称霸呢？我们只能猜测。但美国是存在的，它很多方面都建立在荷兰和英国的传统之上。热那亚略有不同，我从未说过它曾经称霸，它更接近于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海外散居人群形成的那种跨国金融组织。可这不是指葛兰西定义的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那种霸权。地缘非常重要。不过，即使有三个从空间上看大相径庭的霸权，每个霸权的组织特色却又都是仿

效前者。英国从荷兰、美国从英国都借鉴颇多，这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国家，表现出一种滚雪球效应。因此，偶然性确实存在，但系统性联系也是存在的。

问：《漫长的 20 世纪》并未谈及劳工运动的命运。是否因为你当时认为其不太重要，或因为该书的副标题为“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其架构已经非常广泛复杂，再把劳工包括在内将难堪重负，所以你才将其省略？

答：后者的考虑多一些。《漫长的 20 世纪》最初想同贝弗里·西尔弗（我们结识于宾厄姆顿）合著，并且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霸权，后来这实际上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部分本来要写资本，包括资本组织、工商企业以及有关竞争的基础内容。第三部分本来要写劳工，包括劳工和资本的关系、劳工运动等。但有关金融化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周期模式的发现打乱了整个项目。它迫使我违背初衷把追溯的时间拉长，因为这本书确实是想写“漫长的 20 世纪”，即从 1930 年代的大萧条直至今天。当发现金融化范例后，我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漫长的 20 世纪》基本上成为一本有关金融资本自 14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著作。西尔弗因此担负起了有关劳工的研究，其著作《劳工的力量》于 2003 年问世。^①

问：你们 1999 年合著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似乎遵循了你们最初为《漫长的 20 世纪》设计的那种结构。

答：是的，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有关章节包括地缘政治、工商企业以及社会冲突等。^② 因此最初的项目从未放弃。但这确实不是依照《漫长的 20 世纪》而设计的，因为我无法在致力于金融扩张和物质扩张的周期循环的同时再关注劳工问

^① 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u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2003.

^②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1999.

题。一旦把界定资本主义的关注点转向物质和金融扩张的交替循环时，就很难再纳入劳工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要论述的内容太多，而且是因为在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中存在着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变数。首先，正如我们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历史在加速发展。当你在比较一个政权的积累向另一个转移时，你会认识到，在 18 世纪荷兰霸权向英国霸权转移的过程中，与金融扩张和战争相比，社会冲突在晚些时候才出现。在 20 世纪初英国霸权向美国转移的过程中，社会冲突的爆发几乎与金融扩张和战争的出现同步。在今天向未知的国家转移的过程中，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社会冲突的爆发则先于金融扩张，而且主要大国之间也未爆发战争。

换句话说，如果你看一看 20 世纪上半叶，会发现最大的工人斗争都爆发于世界大战的前夜及其之后。这就是列宁革命理论的基础：资本主义对手间的对抗上升为战争，这将为革命创造有利的条件。直至二战，经验主义的观察都可以发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辩称，在目前的转移中，社会冲突的加速防止了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发动战争。因此，就你的问题而言，在《漫长的 20 世纪》中，我决定集中精力全面地、详细地阐述有关金融扩张、资本主义积累的系统循环以及世界霸权的观点。但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我们转向了社会冲突、金融扩张和霸权转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问：马克思在其有关原始积累的讨论中写道，国家债务、信用系统以及银行官僚（在某种程度上是原始积累期间金融和国家的一体化）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道路利害攸关。但《资本论》直到第 3 卷才开始分析信用体系，因为马克思不想涉及利息，即使信用体系一直表现得对资本集中和固定资本的组织等至关重要。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如何围绕金融—国家的联系展开的，这对您的论述发挥着关键作用。马克思的分析中似乎有个缺陷：一方面，他说重要的动态出现于资本和劳工之间；另一方